

海上风物

《繁花》年代的电车

■ 耿勇文

电视剧《繁花》热播后,黄河路热了。虽然如今黄河路已不再是当年的黄河路,可仍旧成为网红,许多人去那里打卡,回忆往昔。

熙熙攘攘,晃悠悠悠,载着乘客,也载着阿宝的13路电车,已无处可打卡,因为它和上海许多路电车一样,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。

在《繁花》的那些岁月里,13路电车从提篮桥到曹家渡,我乘坐的次数比较少。

当时,我居住在江湾五角场,它是上海东北角,城乡结合部。当时,从五角场去市区,也是居民口中常说的“去上海”,最便捷的是乘公交车55路,途经外滩。另外,还有9路电车,沿翔殷路,途经复旦大学去虹口公园。再有便是从黄兴路坐8路电车,在长阳路换22路电车,途经提篮桥,可去外滩。

往现在的江湾新城方向是不通公交车的。因为,沿淞沪路往机场方向,步行穿过不长的低矮破屋,短街僻巷,眼前便呈现出田畴麦垄的场景,风吹稻穗低,处处闻蛙声。

沪上电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记忆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上海的公交车是有轨道的,我们从赵丹、周璇和白杨演的电影中,看得很清楚。我见到的沪上电车,与赵丹拍电影的时间相隔半个多世纪,有轨电车已陆续退出历史舞台,马路上跑的电车,几乎都是无轨的。以后,人们的口中,只有“电车”,而不再说啥“有轨”“无轨”。

那些年,只知上海人住房窄小、拥挤,其实外出乘公交车更挤,那是一段尴尬和无奈的记忆。别看姑娘们长发飘飘,着装时髦,走在闹市的大街小巷,婀娜多姿,清香袭人,可一旦步入公交车人挤人、人贴人滚滚人流之中,便大失所望。

彼时,电车的车型落后,没有空调,车速不快,且摇晃,丁零当啷。电车沿途马路上空总是不够清爽,布满

了纵横交叉的电缆线。8路、9路、13路、20路、22路等都是铰接式巨龙电车,车顶上支着两小辫,前后两节车厢,三扇车门,两车厢连接处像放大的手风琴。此处,有面对面的两排香蕉座位,大转弯时,绞盘转动,座位也转,从车上低头能看见马路地面,连路面的石子块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通常有经验的“挤”车人,不坐此位,也不在此处久立。终点站上车抢位时,香蕉座位属于“鸡肋”,只有无位可坐时,才选择它。

当时,我从江湾五角场,去《文汇报》等新闻单位送稿件,只要看到四平路上的55路公交车终点站,人多拥挤,我便从8路电车终点站上车,到长阳路换乘22路电车去外滩。

与其它的公交车相比,我对8路电车更熟悉,也更有感情。那时,现在的东方商厦、金岛大厦这块是一个孤岛地段,上面有些破旧的白墙黑瓦的平房,有居民居住,也开设有食品店、小饭店和水果摊等。在它南端与蓝天宾馆中间,有条不足百米的小路,连接着黄兴路和四平路,8路电车终点站便在这里。

当时,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员11队党支部,与电车8路党支部结对共建,我作为院宣传处新闻干事,多次去车站参加活动和采访。

车站很简陋,长长的低矮平房,靠路边是一个黑黑的长长的走廊,走廊的水泥台上摆满搪瓷杯、铝制饭盒等,那是司机和售票员喝茶和吃饭用的。夏天天热,在站台的门前,摆放着一个可以收放的木制矮架,上面放了一个大的白色搪瓷大桶,里面盛满凉茶或绿豆汤。登车前,男司机手拿搪瓷大茶杯,还有刚用自来水搓过的湿毛巾,女司机或售票员手臂上戴着绣花镂空的白色护袖。

车站里有一个会议室,一个长桌和几个长条木椅,墙壁上挂着一些锦旗,门口走廊的端头,桌上,放着一个扩音器,调度员便在那里不停地喊话,有许多时候,司机和售票员刚下车,和同事没聊上几句,便又急匆匆地登车。

因跟车采访,我熟悉了8路电车行驶规律,乘车有了一些经验。在终点站时,要留神司机的举动,车到站后,司机戴上厚厚的油迹斑斑的棉手套,从车尾解开绳索,用力将两条“长辫子”拉离电缆线,老乘客就知道,不用再往这辆车上挤,它停泊靠岸了。

乘坐电车最让人郁闷和不甘的事,就是好不容易,在拥挤的人流有了一线生机,有个座位,喘口气,倏忽间,“扑哧”一声,车像泄了气的皮球,没了动力,司机开门下车,把自说自话脱离电缆线的“辫子”拉回来,如“辫子”咬上电缆的瞬间闪着电光,发出噼噼啪啪声,就有救。可有时没反应,司机说车坏了,我们只好下车,凭票换车,又得重新拥挤挤挤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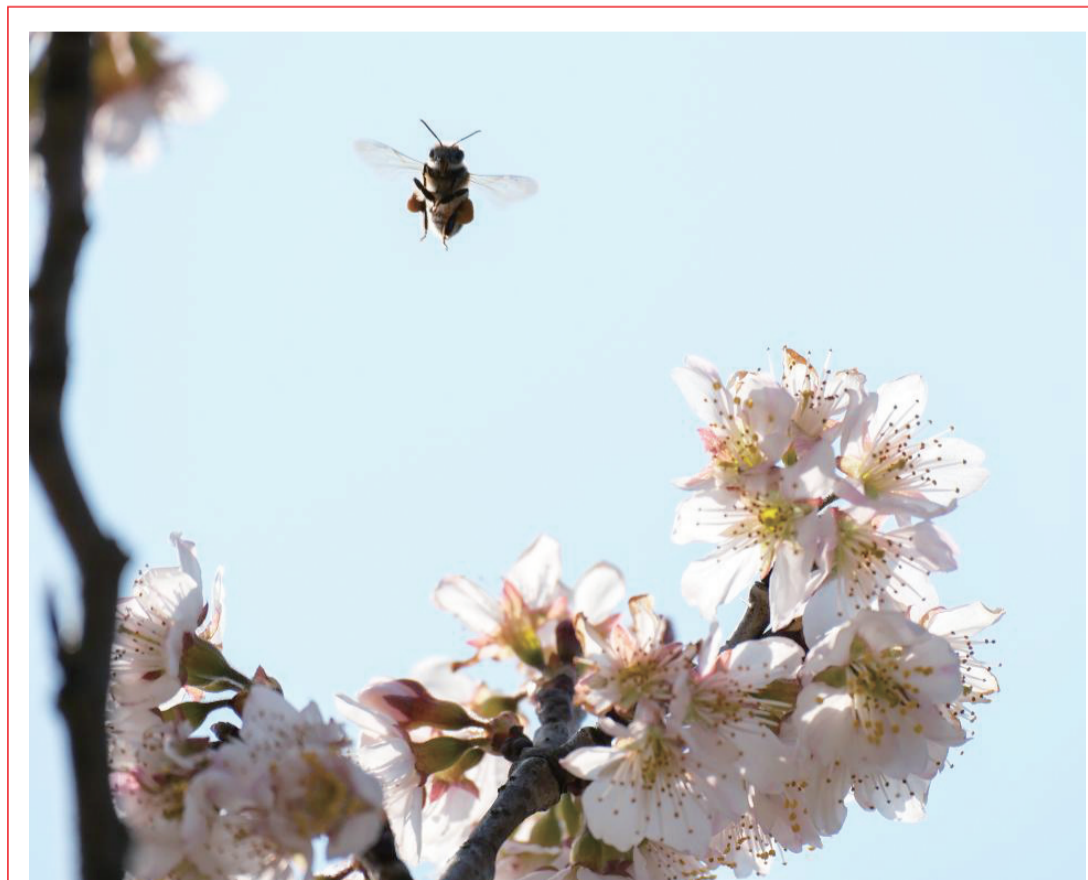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8路电车,我最熟悉的还有20路电车。在南京路还没有步行街,没有观光车那会,逛街逛累了,可乘坐电车20路,不仅省力,且可观光。入夜,南京路上的商店橱窗,流光溢彩,造型各异,加上熙熙攘攘的人流,便是一幅十里洋场的风景画。

电车在南京路上行驶,女售票员手中拿着“慢”字小旗,伸到车窗外,不停地拍打着车厢,让游客避车。为行车安全,车开得挺慢,有许多次,我与女友乘上电车20路,从南京东路到南京西路来回往返,如同观光,欣赏着大都市的繁华。

好像电车里总有浪漫的邂逅。当年赵丹拍的电影里是这样,现在拍的电视剧《繁花》,阿宝也是在电车里找到真爱。

记得那时电车,少有座位,长长的车厢里,靠车窗有纵向贯穿头尾的扶杆,大家上车抢占的最佳位置便是车窗前,尤其是情侣,他们总设法挤到窗边,女友站窗前,男士在身后,左右手抓扶杆,呵护女友,免招被挤。南方雨季多,如天空飘着小雨,落在街旁梧桐叶上,嗒嗒作响,车窗上小雨滴弯曲流淌,雨雾朦胧之中,别有一番风情。

现在,居民外出有自备小车,上高架入隧道,可乘四通八达的地铁、轻轨,还有磁悬浮列车,太便捷了。《繁花》年代,电车上的拥挤和邂逅已成为历史,无处打卡,存储在了一代人的记忆里。



春天 ■ 杜晓荣

旅游日记

在德国做兔子灯

■ 林希文

德国没有元宵节,但他们也有一个灯笼节。

德国的灯笼节是每年的11月11日。在这天晚上,幼儿园的孩子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,提着灯笼在社区里游行一圈。这些灯笼都是自制的,各有创意。有一年灯笼节前,一位在幼儿园工作的德国朋友请我做了一盏灯笼。

在德国怎么做灯笼呢?我好像有些束手无策,没有竹子做灯笼架啊?不过我观察了一下其他德国孩子的灯笼就恍然大悟了。

原来他们是这样做灯笼的:先拿一个气球,把它吹起来。然后呢,就在上面贴彩纸,一层又一层,贴到一定厚度以后就等它干燥,最后再把那个气球刺破,这样一个半圆形纸灯笼就成形啦。

我如法炮制做好了个半圆形的灯笼。

想到中国元宵节的兔子灯,就找来硬板纸,剪了两个长长的兔子耳朵,贴在这个半圆形的灯笼上。然后呢,又给这个灯笼画上了两只红红的兔眼睛,一只小白兔兔就出现啦!

灯笼节后,我的德国朋友告诉我:“你的那盏兔子灯,可太棒了!”

“是吗?是因为两只长长的兔耳朵吗?可是和中国元宵节的兔子灯比起来,实在是太简陋啦!”我心想,你们还不知道咱中国元宵节的兔子灯有多漂亮!

朋友说:“兔子灯的长耳朵固然有趣,但你还不知道你那盏灯笼有什么奇妙的地方吗?晚上蜡烛一点起来,透出好多中国字,太有创意啦!”

哦,我这时候才想起来,当时在气球外面贴纸的时候,为了达到一定的厚度,我是贴了几层家里的旧中文报纸的。没想到晚上蜡烛一点起来,那些报纸上的汉字就全都透出来

意犹未尽

人生如梅

■ 潘钢娟文

小院里的梅,深褐色的树干遒劲有力,古意盎然。新抽出的枝条泛着浅浅的绿意,鼓鼓的红色花苞紧贴枝条,像被顽皮的小孩粘上去似的——次第有序。

一些梅花已经盛放。玫红色的花瓣层层叠叠,小巧精致。白嫩的花丝头顶着淡黄的帽子,颤微微的,像是一只只跳舞的小蝴蝶,让整个小院浸润在一股清雅的冷香里。

这是爷爷亲手栽植的一株梅树,比我的年龄还大。小时,每到梅花开放的季节,爷爷还要和我讲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梅花的故事。

三国时东吴陆凯曾写诗赠范晔:“折梅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此时的陆凯在率兵南征的途中,看到寒梅盛开,想到了在远方的好友。

王安石有诗云: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此时的宋朝人爱梅已成了风潮。有历史学家说,唐人喜爱牡丹,因为雍容华贵,契合大唐盛世的恢宏气象。而宋朝虽然经济繁荣,但因军力不足,外交受挫,所以士大夫更多关注内心世界。哪怕是霜雪严寒,哪怕是孤身一人,也要像梅花一样开放,送来“暗香”。

陆游比王安石更决绝。他说:

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。”梅花有了不朽的灵魂。即便是一株野梅,无人欣赏,即便是零落成泥,这野梅的气冷幽不绝,散入天地,沁入心骨,它的寂清,它的傲骨,让人敬仰。

“平生最薄封侯愿,愿与梅花过一生。”被称为晚清中兴名臣的彭玉麟,品行高洁,满腹才华。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“三不要”原则:不要钱,不要官,不要命。他一生曾六次辞官,仅有一次要官是在中法大战期间。这位奇男子伟丈夫对梅花情有独钟,一生写了数百首咏梅的诗词,也画了数万幅梅花。他的“军中墨梅”和郑板桥的“竹画”并称晚清画坛双绝。

一代伟人毛主席也极爱梅花。他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大开大合: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”梅的坚贞、梅的气势直上云端,无与伦比。“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”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,梅花不畏严寒,在悬崖峭壁中独自开放,为人们带来春的消息。当百花争艳时,它露出了欣慰的笑容,深藏功与名。

岁月荏苒,爷爷栽种这株红梅时,还是壮年。那时的他上有老、下有小,生活困顿。也许是梅的精神鼓舞了他,面对重重困难,他没有退缩。

如今,他已年届耄耋,依然精神矍铄。每到春天,雷打不动,给红梅施肥、驱虫。这株红梅仿佛通了人性,年年暗香萦绕,沁人心脾。“不经一番寒彻骨,哪得梅花扑鼻香。”人生如梅,愿我们像梅花一样在人海里修行成长。